

## 除了古典，還有海派的現代

● 陳緒石

在張愛玲研究每前進一小步都緩慢而滯重的當今，張均新作《張愛玲十五講》知難而進，有較大的創新價值。張均力圖以作家「知音」的身份評說張愛玲，這是該著的一大亮點。



張均：《張愛玲十五講》（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

在張愛玲研究每前進一小步都緩慢而滯重的當今，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均新作《張愛玲十五講》（以下簡稱《十五講》，引用只註頁碼）知難而進，有較大的創新價

值。首先，張均力圖以作家「知音」的身份評說張愛玲，這是該著的一大亮點。一般而言，自二十世紀以來，學者通常更願意逃離作家的磁力場對文本做創造性解讀，設身處地揣摩作家本心和作品原意，這種解讀方式略顯守舊。不過，「誰解其中味」意味着，作家總是希望讀者理解自己的苦心孤詣，當年迅雨對張愛玲的批評引發張的反彈主因在於，迅雨的批評路徑不適合張的個性，因而他未成為張的知音。因此，讀者的詮釋以至任意發揮可能偏離作者的文學本意。《十五講》則貼近張愛玲，意在聆聽她的內在心聲，這是一種以作家為本位的文學闡釋方法，重在探究張的文學本意；同時，它還反駁了部分違逆張原意的觀點。但張均的做法也有不妥當之處。

在研究路徑上，《十五講》先後探究了張愛玲的身世背景、精神世界、文學淵源。具體而言，張均認為張愛玲因其高門巨族的衰敗，故只注重個人、家族的私人利益而不

\* 本文為浙江省教育廳2011年高校科研項目成果，項目名稱為「金錢意識與張愛玲的文學世界」（編號：Y201119839）。

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由於個人甚少得到關愛而缺乏安全感，因而在作品中有一種惘惘的威脅、恐慌感。所以，張大體上未走五四新文學道路，而古典文人的經驗給予她更多的啟示。她的文學創作主要是《紅樓夢》等中國古典文學的延續、發展。這種詮釋是有效的，一能揭示張愛玲的獨特性——她的內心世界容易與古典精神共鳴，古典虛無是她的人生態度，執著於世俗物質的歡悅是她的生存方式；二能解釋在淪陷時期她為甚麼要固執地張揚自己而無視民族大義；三能說明張雖然未能免俗——其1950年代的小說創作與政治關聯緊密，但這是被迫捲入，《十八春》改寫為《半生緣》便是例證。

張均的研究最有價值之處，是將「《紅樓夢》」、「虛無」、「物質」三個關鍵詞糅合在一起論述張愛玲的古典特質。在「知音」張均的視界中，張愛玲的文學創作繼承並發展了《紅樓夢》等作品中的中國虛無哲學精神與世俗物質主義，她的文本流露出古典虛無思想與物質主義的細節歡悅。應該說，這是一種高效研究之路，作者把這三個看似不關聯的詞彙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不少人認為張愛玲的主要文學淵源是《紅樓夢》等古典文學，但鮮明地否認她與五四新文學有血脈相承關係的學者不多；很多學人指出張是一位虛無主義者，但能清楚地辨析她的虛無思想出處的人甚少；物質是張愛玲研究的一個熱點，但指明張的物質主義內涵、屬性的論文亦較少。所以，張均的研究雖不是全新的開拓，但全面性無人能

比。以古典精神為視角解讀張愛玲文學無疑是恰當的。張的作品常常表現出人生虛無與世俗生活的眷戀這種看起來矛盾的情感；但在中國傳統文人的筆下，正因為人生苦短、虛空，故在世的每一刻都應充分享受物質的歡樂。因此，兩者並不矛盾。顯然，唯有把握這種古典情懷才能準確地解讀張愛玲，否則在新文學與外國文學裏我們都難以找尋解密其文學神韻的精神資源。

《十五講》對張愛玲文學虛無的本質屬性有精當的把握。在研究方法上，張均採用了比較方法，一是比較張愛玲與魯迅等人的差異，他認為：「張愛玲的虛無，不宜在魯迅、卡夫卡等（西方）現代主義譜系中去尋求解釋。」（頁113）張愛玲是中國的；二是比較中西虛無主義的差異，中國虛無主義是表層的繁華與本質的虛無同體，西方文化不會產生這種虛無，只會出現魯迅式的絕望與抗爭。

張均的論述還建立在反駁他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張愛玲是現代作家，許多學者將她的虛無與西方現代主義做比較，也有學人以基督教末世論看張愛玲，此類從西方文化尋找資源的研究取向遭到張均的強力質疑。這種先破後立的研究表明，張均非常熟悉該領域的研究狀況，也有信心得出新的結論。

更為可貴的是，張均還指出：「這不是說張愛玲與魯迅、卡夫卡等無甚關係，而是說，張愛玲小說是以中國文化為本，而西方的啟蒙主義也好，現代主義也好，都是促成她的中國傳統『創造性轉化』的條件。」（頁113）這在《十五講》裏是難

張愛玲的作品常常表現出人生虛無與世俗生活的眷戀這種看起來矛盾的情感；但在中國傳統文人的筆下，正因為人生苦短、虛空，故在世的每一刻都應充分享受物質的歡樂。因此，兩者並不矛盾。

作為「知音」，張均對張愛玲的認識、理解較為偏狹，張的家庭背景固然最為重要，可她到底還是社會的人。張均漠視了都市文化、時代背景等社會因素對張愛玲的影響，甚至不認可她是海派中人。

得的學術姿態，至少它表明張愛玲的虛無不是純粹的古典，不過，如能闡述西方現代文化如何成就張的虛無主義，則會豐富張愛玲文學虛無的內涵。遺憾的是，每每觸及該問題，張均都迴避了，好像張愛玲與現代並無任何關係。

迴避、甚至否定張愛玲的文學現代性是《十五講》的一個缺陷。由於張均以古典精神觀照張愛玲，似乎認為這是她的唯一面孔，因此，張均不免否定了張愛玲的現代特質。不少學人研究過張愛玲的現代性，張均在忙着論述其古典精神的同時對這類成果一一做了反駁。這種做法顯然不無商榷之處，因為張愛玲是新一代海派作家，不可能不受到五四新文學與海派文化的影響，論述其現代性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首先，在女性啟蒙上，張走了一條獨特道路，她的小說基於七巧（《金鎖記》）等女性的生存境遇闡發她們自身的弊病，如人性缺陷、精神依附等，這類主題凸顯了其小說改造女性的願景。其次，雖然西方的審美現代性很難在中國對號入座，但1930年代的海派文學確有現代主義的頹廢因素，而且，還有部分小說反對現代工業文明，身處上海又以上海人自居的張難免與現代文化、先鋒文學糾纏不清。所以，摘除張的多副臉孔係簡化了其文學內涵。

《十五講》的最大缺點是張均過於偏愛或執著於所選擇的研究路徑與視角。然而，任何研究都有其有效性，也有其不足。張均的研究路徑是以作家為中心的「知音」路線，切入點是作家的文學淵源，視角為

古典文學精神。但是，作為「知音」，張均對張愛玲的認識、理解較為偏狹，張的家庭背景固然最為重要，可她到底還是社會的人。張均漠視了都市文化、時代背景等社會因素對張愛玲的影響，甚至不認可她是海派中人，這造成的後果是作者筆下的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張愛玲。

茲舉一例。張愛玲的物質主義是《十五講》的一個評說重點，張均歸結為「天性，惶恐無端的身世之感，經典的力量，皆促成了張愛玲的物質主義」（頁293）。難道物質主義就不是上海這座城市的特質？而且，在張愛玲看來，女性是世俗、現實的，她之所以戀物恐怕也是女性的本性使然。所以，張愛玲的物質主義有多重含義，並非張均所說的那麼簡單。

在張愛玲的世界，拜金是戀物的一部分，但古典精神似乎排斥拜金，因為儒家世俗社會歧視商業。張均就認為張愛玲拜金與個人天性以及因在家裏遭受挫折而致使的「惘惘的威脅」有關（頁290）。《十五講》裏的第八講談到張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張均以為她「深得上海人的精神氣韻」（頁226），這句話肯定了她與上海有着曖昧的關係，不過，作為「上海人」的張愛玲究竟有何特點，張均避而不談。

無需深究就能得知，張愛玲的拜金還係上海所賜。她在〈童言無忌〉裏坦承自己愛錢，是上海小市民（張愛玲：〈童言無忌〉，載《流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頁3）。將拜金與上海市民並置在一起敘述，正體現了在上海消費文化語境下市民的拜金特質。

所以，張均的「知音」研究未能完整地把握張愛玲，他的解讀未必全是知音之言，這條為張均喜愛的狹小「知音」路徑實在應予以拓寬。

事實上，張均不僅規避張愛玲的上海人身份，也更未將她視為海派文人，因為在他看來：「海派文人眼中的上海，是摩登的、生猛的，尤令內地沉悶鄉鎮上的青年產生無限好奇。」（頁223）這顯然是一種誤讀，因為當時的上海傳統與現代兼容，並非純粹只有先鋒文化，海派文人如1930年代的施蛰存、穆時英，1940年代的張愛玲、徐訏等，都有包容的氣度。如具體到張愛玲的作品，在當時的內地人看來，難道梁太太、葛薇龍（《沉香屑·第一爐香》）、白流蘇（《傾城之戀》）、淳于敦鳳（《留情》）等還不夠摩登？張均迴避「上海」因素的主因可能在於上海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上海的現代性會賦予作家現代特質，而這與他以古典文學精神為研究視角有所悖逆。張均顯然偏愛且偏信自己的研究視角，故張愛玲的文學現代性未進入他的研究視野。古典視角的有效性與有限性由此可見，它只關注張的古典精神，而忽視、甚至否定了她的多元文學內涵。

學者在從事研究的時候往往偏愛自己選擇的視角，這情有可原，但過於偏愛就會難免造成偏執。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學現象需要從多重視角作出解讀，或許我們可以找到最適合的視角，但這個視角仍不全面，所以，任意否認其他視角的學術價值不太恰當，有時還會導致較為嚴重的後果。譬如，《十五講》偶爾提及張愛玲與五四或西方的聯

繫，但這僅限於知識結構等表層，認為在生命感受、敘事哲學等深層次上張仍是古典的。這基本否定了張的現代內涵，同時也否定了張作為女性作家的價值。試想，如果將張的現代性抽取掉，作為女性作家的張還有甚麼實質內容？因此，申明自己視角的正確不一定就要否認其他，強調張的古典也不必完全否定張的現代，論古典向現代轉換從而探究張古典精神的現代含義，這更有學術意義。

所以，現代性是《十五講》必須面對的問題。一方面，因強調張愛玲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古典作家地位，張均否定了她的種種現代性面孔；另一方面，張均又不得不面對她與五四新文學以及西方文化有密切聯繫的事實。為了應對學術上的尷尬，張均除了肯定張愛玲在淺表層次上接受了西方現代知識外，還提出：「張愛玲小說及散文的成就，應該置放於古典文學傳統的現代轉換的系統內加以評議。」（頁367）但是，「現代轉換」也就意味着張不僅僅是古典的，還有深層次的現代意義。譬如，施蛰存小說《漁人何長慶》等的道家思想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可視之為轉換，從現代性角度看，這是審美現代性（周憲：《審美現代性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151）。可在《十五講》，張的現代性不在常見的文學現代性之列，那她的「現代」究竟有何內涵？

張均另有一個說法，「置之古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一評價系統內，對張愛玲當作如何評價？或者，她模仿《紅樓夢》，那麼，她的小說與《紅樓夢》之間是否存在差

張均顯然偏愛且偏信自己的研究視角，故張愛玲的文學現代性未進入他的研究視野。強調張的古典也不必完全否定張的現代，論古典向現代轉換從而探究張古典精神的現代含義，這更有學術意義。

《十五講》走「知音」學術路徑不是不可以，問題在於作者的學術視野應該更寬廣，張愛玲的上海人身份不能隱匿不露；總結張的古典文學精神並以之為研究視角也有其合理性，但古典精神的「現代轉換」一定要落到實處。

距？假如有，那差距又是多大？」（頁367）這真是奇怪的邏輯。所謂的「現代轉換」或「創造性轉化」竟然指向張愛玲的小說與《紅樓夢》的差距，即以為張的文學史意義就在於她與《紅樓夢》的差距。在古典文學精神的範圍內，這個差距當然很大。因此，無法而又竭力迴避張的現代性不是明智之舉，因為當張的作品只剩下與《紅樓夢》存在着巨大差距時，她的文學價值也就令人存疑了。

《十五講》另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張愛玲的上海人身份。遺憾的是《十五講》不認可張是上海人。如果擴大學術視界，不將張局限在家庭一隅，就會有不同結論：張不僅僅是一個出身於高門巨族、接受了《紅樓夢》影響的古典作家，她還是一個在上海成長、認同上海的現代作家。先看張均的一段話：

「反現代性」乃是建立在現代性的基礎之上，而在「五四」以後，最大的現代性就是通過啟蒙或救亡的手段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而在張愛玲筆下男男女女的生活世界裏，連這方面的信息都難嗅到一絲半縷。這當然是出身舊式家族的張愛玲對民族國家、正義理想諸般事物缺乏興趣的結果。此即是說，張愛玲連「現代性」都未必具備，何況「反現代性」！（頁385）

這段話看似有學理，但遺憾的是，張均還是忽視了上海。

近現代上海是一座具有殖民性質的現代工商業都市，故上海的現代性與一般所謂的「現代性」有所不

同，它不一定先有民族國家概念才出現現代工商業，國外反現代文明陰暗面的先鋒、時尚因素也登陸上海，如新感覺派小說等。所以，從「海派文人」角度看張愛玲，她的反現代性不是沒有可能。當張穿上旗袍或其他古裝炫耀時，難道她只是一個古典主義者？她在與時裝界比時尚、先鋒，而且，個性張揚也不無對現代日常生活秩序作反抗的意味。這或許就是張均欲說還休的古典精神的「現代轉換」，現代是其必備的含義。

還要指出的是，《十五講》完全沒有必要在言說張愛玲古典精神的同時否認她的現代意義，因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品格其實有兩大資源：一是西方現代文化，一是中晚明以來的哲學與文藝，後者以碎片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體系；就對文學的影響而言，前者顯性，後者隱性。隱性的主因在於新文學力圖扭斷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以西方現代文化作為精神資源。張是現代作家中為數不多的例外，她承續《紅樓夢》等的古典文學傳統，難道就不能延續《紅樓夢》等的現代人文情懷？而且，這種人文傳統還可以與西方文化聯合。所以，張應該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其文化資源寬廣，中西兼容、古典與現代並包。

綜上所述，《十五講》走「知音」學術路徑不是不可以，問題在於作者的學術視野應該更寬廣，張愛玲的上海人身份不能隱匿不露；總結張的古典文學精神並以之為研究視角也有其合理性，但古典精神的「現代轉換」一定要落到實處。張不

是一個單純的古典符號，家族衰敗的陰影、個人童年的心理創傷，甚至包括她戰時的體驗與現代上海的先鋒文化因素諸如頹廢、虛無等確有共鳴之處，否認這一點，就難以

看到張古典精神的現代意義。顯然，《十五講》應該敢於面對而不是迴避上述問題，因為這樣做有助於揭示張愛玲古典文學精神的複雜內涵。

## 一個書法文化世家的生命基因

● 王田葵



曾昭薰：《湖南歷代文化世家·道州何氏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在中國文化傳承的線索中，各個歷史時期都曾有一批數代相傳、各具特色的文化世家。在這些家族

中，文化精英輩出，文化成果不斷，對推動中華文化發展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和貢獻。曾昭薰的《湖南歷代文化世家·道州何氏卷》（以下簡稱《道州何氏》，引用只註頁碼）一書，通過作者多年對湖南永州人文歷史的考察和研究，從外內兩個側面考察了道州何氏書法文化世家賴以崛起、取得成就和影響的「健康基因」。該書結語寫道：「道州何氏家族是我國中晚清時期一個著名的文化世家。它的崛起突兀而又悠遠，它的成就厚重而又獨特，它的影響深廣而又持久。它是湖湘文化肌體上的一個細胞，卻又承載着這一文化全部的健康基因。」（頁279）

大凡皇權制時代士大夫文化世家的生命傳承，必然受到外內雙重生命基因的宰制：向外求索仕途功名，並代代經營出耕讀、入仕傳家基因；向內追求審美情感本體，以之作為人生安慰、寄託、歸宿和方向。這種精神基因恰恰是書法藝術創新的動力。

《道州何氏》一書通過作者多年對湖南永州人文歷史的考察和研究，從外內兩個側面考察了道州何氏書法文化世家賴以崛起、取得成就和影響的「健康基因」。